

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

蔡昉

摘要：从跨国数据观察世界经济增长特征，可以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前期和中期，增长率在国家之间有趋同的趋势；在中等收入阶段较晚的时期，在临近甚至刚刚超过高收入门槛的阶段上，各国的增长表现往往产生分化。这提示我们，在中国的人均 GDP 水平靠近高收入门槛之时，仍然存在着保持可持续增长动力的挑战。为了让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更为准确和明晰，同时增强其对于中国的针对性，不妨将其转换为一个更加鲜明的概念——“门槛效应”。本文简述了与该概念相关的理论渊源，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揭示了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与此相关的发展阶段。在分析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本文也指出了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所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趋同 分化 门槛效应

一、引言

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关于东亚经济的主题报告中，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一个“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2008）。由于中国经济的两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变化，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成为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讨论的热点。第一个阶段性标志是2009年中国跨入世界银行分类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①行列。当时，决策者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显现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特点^②。第二个阶段性标志是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当年首次从以前的两位百分数增长率降到8%以下，并且随后逐年有所下降。虽然当时多数观点认为这个经济增速下行是周期性现象，但是也有人意识到减速是中等收入阶段某种固有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致担心这种减速成为趋势性的常态。

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1美元，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9200美元），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12235美元）。也就是说，按照现行增长速度推算，几年内中国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看不出有任何因素能够中断这个预期的增长速度。那么，一个问题必然会出现，即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经济学概念是否对于中国仍然具有针对性。

早在2014年，针对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关注的这个经济学概念和发展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③谈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仍需付出的努力时，他还多次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行百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①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和数据库中也包含一些非主权国家的样本，所以，做总体观察时，对象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地区。为简洁起见，除非进行单个对象的分析，文中不再专门说明。

②这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表述，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响应和讨论。参见Roach(2009)。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里者半九十,旨在提醒未来的道路更加曲折艰难。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的内涵拓展了,将其与更高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迎接什么挑战、需要跨越哪些沟坎联系到了一起。

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经济学命题,并不只对于统计意义上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情形有意义,而是有着超出这个范围的一般发展意义,其中凝结着诸多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一些就是与阶段性跨越相关的门槛效应。从经济史的观察看,不仅存在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困境的情形,更有着大量未能摆脱低收入均衡陷阱,堆积在中等收入门槛前的情形。从作为一些国家困于超稳定均衡与国家之间产生分化这两种现象并存的现实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所关注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打破超稳定均衡状态,进入持续增长良性循环的问题。因此,这个命题应该具有更普遍的适用价值或一般性。

其次,人们在更为深入的观察中发现,在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摆脱的案例中,更为典型的实际上是那些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国家,特别是接近乃至刚刚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国家,遭遇到难以逆转的经济增长减速,人均收入水平从而停滞不前,不再能够向更高的分组地位攀升。可见,在利用这一概念或框架研究经济发展现象时,与其拘泥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过于宽泛和冗长的时段,不如把关注点更加集中在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分界线或高收入门槛上面。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转化为高收入门槛效应。

最后,跨过高收入门槛,从而在统计意义上获得高收入国家的地位,既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就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国家,也不能保证该国便进入一个不会发生倒退的良性循环。例如,按照世界银行数据,2011 年有 21 个国家人均 GDP 在 10000~20000 美元(2010 年不变价)之间,到 2018 年,其中有 8 个国家经历了人均收入的负增长。这还不包括一些小型经济体,以及委内瑞拉等遭遇严重经济衰退的经济体。如果把人均收入刚刚超过 10000 美元的国家称为“新晋”高收入国家,其随后出现概率高达 38% 的倒退现象,无疑证明存在着一种门槛效应。

与此同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更具一般意义的命题,是针对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针对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着眼于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聚焦在高收入门槛效应上面。

二、走向高收入:从趋同到分化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亚洲金融危机 10 年后,主要针对亚洲地区发展提出的一个新命题,但是,与此相关的问题很久以来在发展经济学中就有讨论。人们关注过的许多经济发展现象,在这个框架中都能找到对应的意义。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都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并且可以分别用两种经济学范式来表达。

首先,在发展经济学的语境中,这个“陷阱”描述的既是一种超稳定均衡状态,又是一种分化现象。落入陷阱的经济体意味着陷在低速经济增长及其相关的诸多困境之中无力自拔。这是经济学中“陷阱”的本来意义。从宏观的、比较的和统计的视角,陷阱具有一定的众数特征,即数量不在少数的经济体遇到减速现象,甚至陷入增长停滞状态,虽然总会有另外一些经济体打破了这种均衡状态,实现了跨越性的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国家之间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分化现象。

其次,这里的“陷阱”表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克鲁格曼(Krugman, 2019)在谈到不确定性时,认为它是平均值的降低而不是方差的扩大。而对于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既表现为平均值的降低,同时表现为方差的扩大,具体表现则是更多经济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倾向于减速。与此同时,各经济体在增长表现上产生巨大的分化。

可以通过观察世界经济趋同过程中各经济体的表现^①,增进对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认识。图1描述了1990年人均GDP与1990—2017年年均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从不那么显著的负斜率关系,可以认为这期间世界经济整体上具有趋同的趋势。虽然第一张图把有数据的经济体都包含在内了,但是,高收入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分布范围极大,因而在图中的显示也比较分散,妨碍了对这些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表现的观察,特别是妨碍对于门槛效应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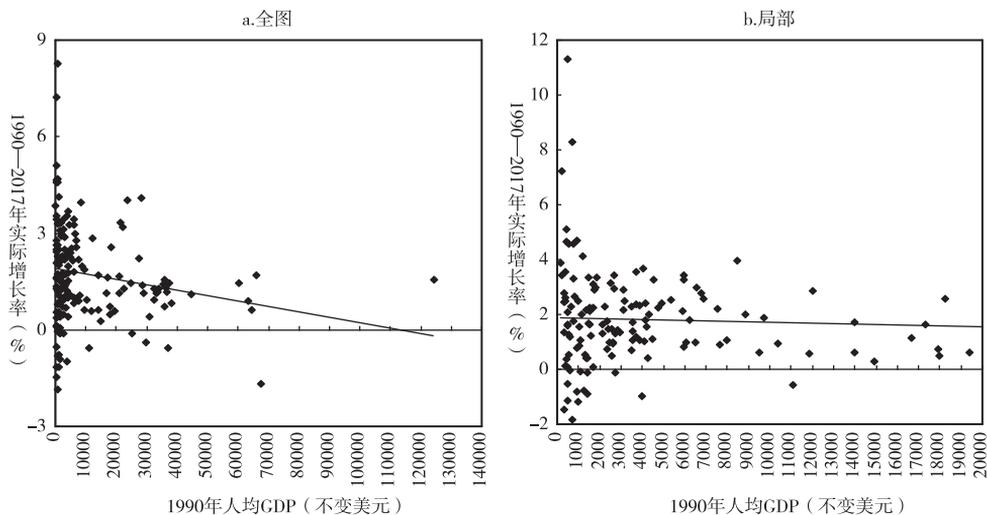


图1 初始人均收入与增长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

例如,世界银行目前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是12235美元,2018年属于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仅48个,为全部有数据的国家总数的22.4%。高收入国家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平均为44706美元,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则为43512美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是摩纳哥,为门槛标准的10倍以上。这种具有如此大的离散程度的国家分布,以及收入如此之高的异常值,与本文所关心的现象并无密切的联系,反而因其跨度太大妨碍聚焦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第二张更局部的图中观察一个与中等收入陷阱更为相关的“门槛效应”。

在图1的第二张图中,本文描述了从人均收入最低的低收入国家到人均收入达到20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情形。之所以设定20000美元这个上限,主要是为了使该图更加聚焦于“门槛”,即观察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以及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跨越前后,国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国家之间会有怎样的分化。同时,由于达到该水平之上的国家可以被认为总体进入了良性循环,或者说可以稳定自身作为高收入国家的地位,也便不必列入本文的考虑范围了。这样,当观察图1的第二张图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整体上呈现一定的有规律变化趋势(趋同)的同时,国家不仅在个体上具有很大的变异特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也显现出某种组群特征。

首先,在1000美元这个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分界线左右,国家数目形成堆积。这意味着,在1990年,全世界有很大比例的国家尚未摆脱低收入陷阱。例如,国家数量在低收入、中等偏下、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四个组的分布,1990年分别为22.2%、33.3%、19.3%和25.1%。到2017年这个分布有了很明显的改善,上述几个收入组的比例依次为13.6%、27.8%、27.2%和32.0%。这种分布变化与观察到的世界经济趋同现象无疑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方面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体,另一方面这类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比重无疑远远大

^①之前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趋同的趋势。参见蔡昉(2019)。

于其国家数量的全球占比,因此,摆脱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头号挑战。

其次,在人均 GDP 为 12000 美元这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左右,虽然观察值略显稀少,但是增长速度呈现出整体向下并分化的趋势。这就是本文所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的现象,并以平均值降低和方差扩大两个特征同时表现出来。在这里,平均值降低的含义是说,这是一个减速的区间。从图 1 可见,在中等偏上收入组靠近分界线以及略微超越分界线的人均收入阶段上,经济增长减速出现的概率明显扩大。在这里,方差扩大的含义则是说这是一个分化的区间。在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后期和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前期,增长速度在国家之间有一定的“趋中”趋势,而到了临近高收入门槛时,增长速度的离差再次扩大。

三、收入、人口与增长的关系特征

为了能够进一步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讨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表现不尽相同,特别是临近高收入门槛时出现减速和分化现象,本文可以做一个抽象的概括,即把前述统计中表现出来的先趋同、在跨越门槛前后再次产生分化的趋势形象地表述为一个 X 型曲线。如图 2 所示,曲线 a 表现为在发展早期有较快增长率的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速度有所下降。这实际上是本意上的趋同现象;曲线 b 表示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未能实现较高速度的国家,逐渐有机会提升增长速度,融入趋同大势之中。这也是趋同假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曲线 d 和 c 并不一定分别为 a 和 b 的延续,而是表示在临近乃至跨越高收入门槛前后,倾向于产生国家之间再次分化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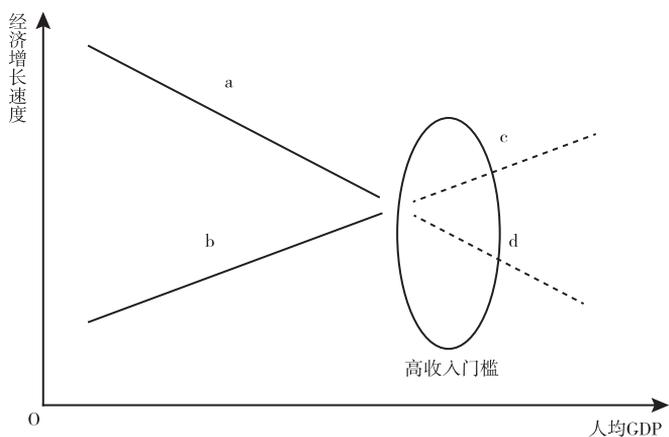


图 2 统计上的 X 型曲线和经验上的门槛效应

这种在迈向高收入然而尚远离门槛的阶段上显示出趋同倾向,而在临近或跨越门槛的阶段上趋于分化的统计现象,与经济学家观察到并广为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所针对的对象、问题和表现是一致的。因此,针对中国已经临近高收入门槛的现实以及此时通常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不妨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转化为对门槛效应的讨论,以便更精准地找到问题所在,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当人们谈到诸如“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话题时,所指的自然是那些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更大的概率陷入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或者极度缓慢状态,以致始终不能从该阶段“毕业”,进而升级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情形。这里,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好,高收入国家也好,都是依据世界银行的分组。根据最近的标准,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划分,1005 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006~395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956~1223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超过 12235 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由于 GNI 与 GDP 差别极小,学术界通常用人均 GDP 来界定收入分组。

对世界上有数据的国家,按人均收入做出这样的分组,与国家真实的贫困或富裕状况是否一致?特别是各组之间的分界线或“门槛”何以不是主观决定的,而是与学术界研究的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有实质性关系呢?为了解答诸如此类有意义的疑问,本文先考察一下世界银行按照人均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组的历史依据,即看一看人均收入分组的来龙去脉。

根据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说明^①,该机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就开始把国家按照人均收入分组。当然,在那之后进行过许多次调整。最初,世界银行把“发展中经济体”区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两组,把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统一定义为“工业化”国家,在这两类之外的其他经济体则分别归为“资本过剩石油出口国”和“中央计划经济体”。

现行的分组即把各国分别归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四个组别,始于 1989 年。那一年,工作人员在提交给执行董事会的报告《人均收入:国际可比数据的估算》中,大体套用了世界银行贷款标准或项目执行标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国家组别分别确定了分界线。高收入国家不是世界银行的借款方,因此没有可供确定分界线的工作依据。但是,当时把所有先前定义的“工业化”经济体一律归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收入最低的国家人均 GDP 为 6000 美元,因此这个水平也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分界线(World Bank, 1989)。在此基础上,加上以后继续进行调整,就形成如今这四个分组及其分界线或门槛标准。

作为世界银行决定贷款和项目类别的标准,这种分组的初始依据与国家的实际发达状态应该说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对于世界银行决定是否应该成为贷款对象、实施哪种类型的贷款项目、以什么样的条件贷款等有意义的初始分组依据,使得如今的这种人均收入分组内在地具有了意义。随后的分析将表明,这为本文分析并解答为什么会出现发展中的门槛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进一步,观察人均收入分组与人口转变阶段的关系。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表明,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即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转变阶段变化上,一国经济可以因人口红利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而在劳动年龄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甚至反而上升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增长源泉则式微甚至消失。

由此出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国家按照人口转变阶段分为四组:(1)2015 年总和生育率不小于 4,预计 2015—20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被定义为处在前人口红利阶段;(2)2015 年总和生育率小于 4,预计 2015—20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被定义为处在早期人口红利阶段;(3)1985 年总和生育率不小于 2.1 的更替水平,预计 2015—20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被定义为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4)1985 年总和生育率小于 2.1 的更替水平,预计 2015—20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被定义为处在后人口红利阶段(World Bank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6)。

在图 3 中,本文把按照人均 GDP 进行分组的情况,与按照人口转变阶段分组的情况进行对比。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属于前人口红利阶段、早期人口红利阶段、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分别与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几近完美地一一对应。这就是说,经济发展阶段与人口转变阶段具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因而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①“How are the income group thresholds determined?”,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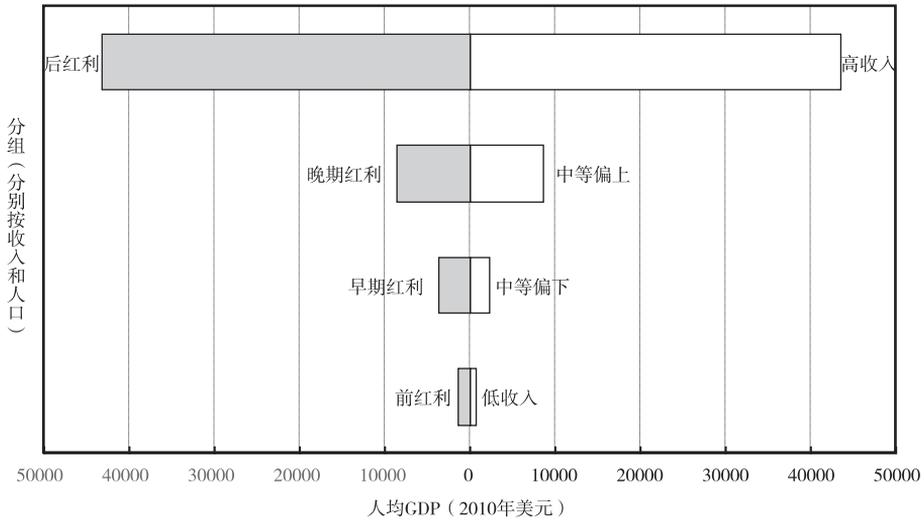


图 3 国家分组：按人均 GDP 与按人口转变阶段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

四、门槛效应的理论和经验

在到达低收入组与中等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分界线之前，国家大量堆积的现象，或大量国家未能摆脱低收入陷阱状态的事实及其成因，是发展经济学诞生的动机和旷日持久的话题，不同时期都产生过大量文献，对贫困恶性循环的原因做出深入的讨论。例如，纳克斯(Ragnar Nurkse)从生产不足导致的消费不足出发，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贫困是一个因果循环，其中，资本不足既是这一因果链条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低生产率导致低收入，进而导致储蓄意愿不强和积累能力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反过来维系着这个产出不足的循环。纳克斯把这种恶性循环看作是一种稳定均衡状态，称之为“欠发达均衡”。实际上，这一解释与其他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所称的“贫困陷阱”十分类似，而且得出的政策含义也相同，即需要一个临界最小规模的储蓄水平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或所谓“大推动”(big push)(Bass, 2011)。

虽然纳克斯的代表性著作出版于 1953 年，但是，这一理论所刻画的欠发达状况及其特征，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仍然具有针对性。以资本积累为例，可以看到低收入国家仍然具有储蓄率低特征。从世界银行“国家总储蓄率”(国民总收入减去国民总消费再加上净转移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这个指标看，2017 年，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平均为 25.4%，显著低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 27.5%)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 31.7%)。虽然高收入国家平均为 23.1%，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但是，按照罗斯托(1960)的发展阶段划分，前者无疑已经进入到“大众高消费阶段”甚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再需要追求高储蓄率了。

关于是否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自该概念由世界银行专家提出以来，在发展经济学家中引起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局面。至于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或者临近或者刚刚跨入高收入门槛，较多的国家遭遇经济增长的减速，并且出现国家之间分化的现象，即一种典型的门槛效应，则可以被当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的一个特殊焦点。虽然对于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经济解释众说纷纭，迄今却没有形成具有主流地位的理论模型或研究范式。

经济现实需要经济理论予以解答，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迫切地呼唤着具有说服力的经济理论。2017 年，世界上被归入中等收入组的国家占全部有数据可依的国家的 54.7%，其中又有 37.6% 被定义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可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乃至聚焦于门槛效应，是发展经济学不容回避的课题。

国家一旦摆脱低收入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经历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不过,一般来说这个较快的增长既不是天生注定的,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为了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纯粹的门槛效应以及对中国的针对性上面,本文先来排除两类国家的情形。一类是那些过度依赖自身得天独厚资源禀赋的国家,由于没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而遭遇“资源诅咒”,过早触及增长天花板的情形;另一类是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的国家,由于受到体制弊端、经济结构不平衡等制约,因而过早遭遇增长减速的情形。本文主要关注那些总体上顺利完成了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任务的国家,研究其随后遭遇增长减速以及面临如何跨越高收入门槛挑战的情形。

在中等收入阶段实现正常经济增长的国家,通常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在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当人口转变到达特定的阶段,人口特征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积累和生产率提高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便形成人口红利。一旦具备了这个发展条件,随着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以及妨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障碍得到清除,农业和其他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便随着工业化积累的扩大转移出来并获得重新配置,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虽然事实上各国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和吸纳,并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由于早期工业化国家发展所延续的时间很长、增长速度较慢,以致结构变化表现得并不像当代发展中国家那么显著。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并没有二元经济发展的地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源泉也不甚了解(Krugman, 1994; Young, 1994)。

之所以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得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这超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期,由于这难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内做出合理的解释,许多经济学家对其可持续性予以坚决的否定),是因为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把早期发展经验中缓慢加以利用的增长源泉,在一个更快的结构变化过程中集中释放了出来。形象地说,早期工业化国家盯着每一颗果子的成熟过程,每熟透了一颗便随时摘取;而经历二元经济发展的国家,在其起步之前便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内卷化或剩余劳动力积累过程(蔡昉, 2015),已经形成了大片的成熟且“低垂的果子”,一旦解除束缚增长的体制障碍,诸多增长源泉都唾手可得。

从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看,除了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中等收入国家常常可以观察到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优势外,由于教育发展使新成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禀赋,充足劳动力供给同时也成为人力资本改善的优势。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即较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助于提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也使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既高且持久。从生产率提高的角度看,一方面,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另一方面,在技术、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都可以使后起国家节约大量的学习成本并避免诸多试错代价,尽享后发优势。

随着人均收入向中等偏上阶段水平提升,以及越来越接近于高收入门槛,一个国家的人口转变也进入更高的阶段,这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及至转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而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减弱,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呈现。这意味着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再能够维持以往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发生变化,劳动力在产业间重新配置的空间收窄,技术和体制创新中的后发优势也变弱。

归纳起来,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国家潜在增长率的降低是符合发展规律的。首先,在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特征的情况下,继续投入资本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其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仍然存在,造成资源误配的结果。最后,长期依靠低成本要素和帕累托改进空间,造成许多国家缺乏以创造性破坏驱动创新的能力和承受度,难以及时获得新的增长动能。面对发展阶段决定的自然减速以及条件约束,不同的国家在应对上有差别,在发掘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增长源泉上面表现不一,因而国家之间产生分化便是难以避免的。

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及其合作者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出发,专门研究了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现象,为前述关于门槛效应的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在 2011 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按 2005 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 GDP 达到 15000~16000 美元的时候,许多国家倾向于减速(Eichengreen et al, 2011)。随后在 2013 年文章中,他们进一步发现,统计意义上的国家增长减速,实际上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在人均 GDP 处于 10000~11000 美元期间,第二次在 15000~16000 美元期间(Eichengreen et al, 2013)。

为便于与本文关心的发展阶段对应起来,可以对上述作者使用的按 2005 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进行换算。结果表明,无论是一次性减速还是两次减速,他们所发现的增长减速时的人均收入,恰好是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 2010 年(按 2011 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为 10382 美元)到 2018 年(14192 美元)期间的水平。同一时期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应的按 2010 年不变价汇率法计算的人均 GDP,则是从 6344 美元到 8538 美元之间,而对应的现价人均 GDP 则为 6344 美元到 9200 美元之间。很显然,艾肯格林等讨论的减速时点人均收入水平,有可能延伸到高收入门槛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见,他们研究的减速对象与本文所讨论的门槛效应完全对应。不仅如此,他们所观察到的减速或分化原因,实际上与本文提出的解释也是一致的。

在 2013 年的文章中,艾肯格林及其合作者(Eichengreen et al, 2013)发现,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以及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比重提高,有助于降低国家减速的概率。而在 2011 年的文章中,艾肯格林及其合作者(Eichengreen et al, 2011)则更概括性地指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减速的 85%。这些经验证据恰好印证了本文提出的门槛效应假说。接近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既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处于晚期人口红利甚至后人口红利阶段,这意味着它们刚刚丧失了驱动增长的人口红利,必须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模式。能否实现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变,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幅度,而这上面的差异则导致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

五、发展阶段转变中的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高速增长也主要依靠人口红利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是人口转变因素。1978—2010 年,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均 1.8% 的速度增长,而在此范围之外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则以年均 -0.2% 的速度徘徊,形成一个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第二是劳动力重新配置因素,即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1978—2018 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 70.5% 下降到 26.1%,非农产业成为吸纳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

这两种因素所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即通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迅速改善、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以及劳动力重新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把特定阶段的人口转变过程转化为有利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收获过程^①。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降低到更替水平之下,而劳动年龄人口自 2011 年以后便进入负增长。按照前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中国已经处于晚期人口红利和后人口红利两个发展阶段之间。实际上,以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降到谷底为标志,中国经济赖以实现高速增长的人口转变因素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式微,劳动力供给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渐缓、资本报酬递减和资源重新配置效

^①这方面的文献包括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代理变量的经验研究,如 Wang & Mason(2008);也包括从促进增长各种变量来看的计量研究,如 Cai & Zhao(2012)。

率改善空间缩小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且,随着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这一减速趋势将继续下去^①。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固然具有一些与常态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却并未表现出大趋势上的明显异常。例如,中国在2012年开始减速时人均GDP为5336美元,与艾肯格林等常态减速时点的低限(2010年不变价人均GDP约为6344美元)相比似乎来得更早。但是,减速前中国经济增长率比常态模式中的任何经济体都更高,甚至减速后的增长率也仍然高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这个减速可谓保持了自身一贯的特性。

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表现,在从根本上并无异于一般模式的同时,的确打上了一些中国人口转变特征的烙印。观察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些异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既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减速来得偏早,同时还能说明何以减速后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并且帮助本文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所在。

与许多其他经济体相比,既作为迅速的经济社会变化结果,也由于特殊的人口政策作用,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总和生育率从5降到更替水平2左右,在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用时仅为欧洲发达国家的1/4。相应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也是在十分集中、更为浓缩的时间里被释放出来的。例如,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和非劳动年龄人口稳定不变的人口机会窗口,实际上仅仅维持了30年的时间(1980—2010年)。在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就进入较高的老龄化阶段,以及较早开始了经济增长减速,虽然可以用“未富先老”进行特征描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既有潜力已经消失,也不注定中国经济不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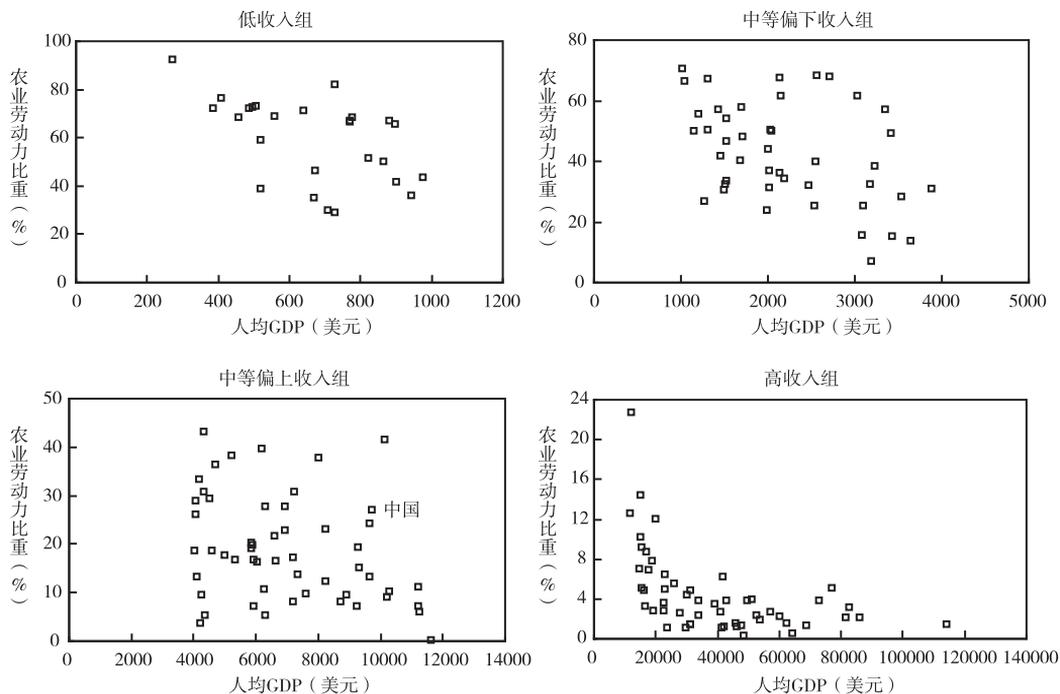


图4 人均收入与农业劳动力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

在前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人口因素中,人口转变因素总体而言是不可逆转的。然而,劳动力重新配置因素的潜力却尚未挖掘殆尽。2018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虽然已经大

^①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和预测,可参见 Cai & Lu(2013)。

幅度下降到26.1%，但是，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值和劳动力比重都持续下降，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尚存，并且潜力是巨大的。

在图4中，本文按照四个人均收入分组刻画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过程。从中可见，国家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阶段转变中，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而且下降幅度和下降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可以从高达80%以上的水平下降到只有1%左右的水平。2018年，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中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却明显高于同一组别的大多数国家。因此，推动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机会窗口，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途径，使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幅度更小一些、节奏更缓一些。

然而，纯粹与人口红利相关的经济增长源泉终究会枯竭，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必然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源泉也会逐渐消失。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个生产率提高既如“低垂的果子”般唾手可得，也具有不涉及既得利益群体的帕累托改进性质。相应地，当经济发展转向更高阶段时，新的增长动能产生于不尽相同的源泉和机制，需要围绕建立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并形成新的社会政策框架。

六、结语和政策建议

把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遇到的增长瓶颈问题，进一步聚焦于临近高收入门槛时的特殊挑战，对于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这个特别的发展阶段，长期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恰好形成交汇。围绕着本文讨论的门槛效应，特别是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增长挑战，需要在看似对立的经济学文献及其政策含义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虽然这并不是说需要做出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要求政策关注点有所转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建议才更有针对性。

无论是否明言，早期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通常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出发，结合结构变革理论和人口红利假说，因而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源泉^①。除了前述关于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外，还有经济学家专门以亚洲经济体为对象，研究了产业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得出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McMillan & Rodrik, 2011；Bosworth & Collins, 2007）。另一方面，研究企业间规模变化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文献，通常得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成长与萎缩以及进入与退出，是超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Foster et al, 2001, 2008）。

这两类研究之间其实是内在关联的。也就是说，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从而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趋于结束，一个经济体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必然要回归到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模式上。

微观组织有消有长、有进有退、有生有死，是一个经济体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生物机制。在增长源泉“低垂的果子”所剩无多、效率改善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特征的情况下，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尤其不能回避。因此，针对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应该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以各种经营主体公平而充分竞争、易进能出、优胜劣汰为机制建设的目标，以改革红利显著性为优先顺序的确定原则，在以下方向上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强社

^①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如西蒙·库兹涅茨(1971)、Aoki(2012)、Williamson(1997)。

会政策建设。

首先,探索市场机制“无形的手”与政府作用“有效的手”内在有机的协同作用,需要把竞争理念嵌入产业政策内核之中,化有形于无形。为此,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创造性破坏环境,改革的总体设计要不同于强化相关部门工作的部署,真正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为了把创新发展理念转化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在竞争领域让所有经营主体平等进入、公平竞争,同时让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没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经营主体容易退出,从整体经济层面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新动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其次,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个重点,是把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推到国际竞争环境之中。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保护可以使企业暂时避免竞争,为培育幼稚产业赢得时间,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实施得当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政策持续下去却不利于形成创新激励,还会造成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巨婴”。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必须依靠充分竞争形成创新的激励和可持续动力,越是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平等竞争,创新成果才会更充分涌流。为此,要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适用范围,按照全面开放原则逐渐形成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全覆盖。要在所有竞争性领域对国内外企业和投资者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依法清除所有妨碍公平竞争的局部政策和做法,维护对外开放和国内市场统一。

第三,对那些已经取得共识,能够创造立竿见影、真金白银红利的改革措施,应该按照合理的红利分享和成本分担原则,着力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和拖延,以缓解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压力,同时推动改革向更加深入的领域拓展。改革与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反,改革红利即通过改革提高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既有利于稳定增长速度,还能以卡尔多改进的方式支撑进一步的改革,形成改革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最后,加大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织密社会政策托底的安全网。增长动能越来越依靠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创新、推进改革中帕累托改进性质减弱、国际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减少和竞争性增强,以及经济全球化逆风和国际宏观经济不稳定,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不应该寻求避风港,而要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适应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新角色。在创造性破坏中,僵尸企业必须处置,传统产能需要淘汰,甚至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也应该更新,但是,劳动者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因此,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再分配政策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托底是创造性破坏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蔡昉,2015:《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第7期。
- 蔡昉,2019:《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
- 罗斯托,1960:《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译本,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西蒙·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译本,1985),商务印书馆。
-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2008:《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
- Aoki, M. (2012), “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M. Aoki et al(eds),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Bass, H. (2011), “Ragnar Nurkse’s development theory: Influences and perceptions”, in: R. Kattel et al(eds), *Ragnar Nurkse (1907–2007):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Its Relevance for Today*, New York: Anthem Press.
- Bosworth, B. & S. Collins(2007),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943.
- Cai, F. & W. Zhao(2012),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M. Aoki & J. Wu(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Cai, F. & Y. Lu(2013),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R. Garnaut et al(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NU E Press.
- Eichengreen, B. et al(2011),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 Eichengreen, B. et al(2013),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 Foster, L. (2001),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C. R. Hulten et al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ster, L. et al(2008),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1):394—425.
- Krugman, P. (2019), “Tariff tantrums and recession risks: Why trade war scares the market so much”, *New York Times*, Aug. 7.
-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6):62—78.
- McMillan, M. S. & D. Rodrik(2007),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143.
- Roach, S. S. (2009), “Unstable,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in: S. S. Roach(ed.), *Stephen Roach on the Nex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lobalization*, Hoboken: Wiley.
- World Bank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6), *Development Goals in an Era of Demographic Change: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5/2016*,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 Wang, F. & A. Mason(2008),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 in: L. Brandt & T. G. Rawski(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J. (199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6244.
- World Bank(1989), *Per Capita Income: Estimating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Numb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Young, A. (1994),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8(3/4): 964—973.

From the Middle-income Trap to the Threshold Effect

CAI F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 Obser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across the world, one can find tha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hase of the middle-income stage, growth rates tend to converge among economies, whereas the growth performances tend to diverge in the late phase of the stage and even for economies just cross the high-income threshold. This suggests that as China moves toward the high-income threshold,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of maintaining growth momentum.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cept of middle-income trap more relevant for China, this paper recommends a shift of the scholarly research and policy focus from the middle-income trap to the threshold effect. The paper then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to which China is now found to be relevant. After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pointing out its sources of sustainable growth at such a special stage.

Keywords: Middle-income Trap; Convergence; Divergence; Threshold Effect

(责任编辑:何伟)

(校对:杨新铭)